

一本好书， 终生的朋友

一个人一生中总要读许多书，有的书匆匆邂逅再无缘相见，有的书却是终生的朋友。因为，那书的字里行间包含着太多的生活滋味。我读美国作家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就有这样的感觉。

小说讲述了迪林汉·扬和他妻子德拉的故事。迪林汉·扬有一块吉姆三代祖传的金表。而他妻子德拉有一头美丽的头发散披在肩上，像一股褐色的小瀑布，奔泻闪亮。他再有一个表带或她再有一个发卡，都能让其中的一个人更体面地走在生活的舞台上。这对贫困的夫妻彼此心中悄然许愿，让他(她)的生活有一种改变。在圣诞节的那天晚上，他们惊异地看到对方的礼物。丈夫把手表变成一个精致的发卡，妻子却用美丽的头发换一个表带。他们都想给对方一个惊喜，但都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只把深深的爱情烙印在俩人心目中。

20多年前我第一次读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集，总觉得他的很多作品都带着浓郁的商业色彩。大都市的灯红酒绿、光怪陆离，让人目不暇接。但这篇小说却给读者描述了一个丰富的情感世界，作者的语言像携着一股淡淡的清风，让人读后有一种很温馨的感觉。

我喜欢这篇小说还有另一个原因，那时我已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在现实生活中我的经验不足，难免尴尬。为寻求感情的寄托，我就在爱情文学中中餐养。这些阅读悄然改变着我的生活。我的女朋友们在我们第一次散步时，就悄声问我：“你是不是读过很多书？”那时，我正享受着读书的美好，也很炫耀地把《麦琪的礼物》用最简短最温馨的语言复述给她。她听后有些羞赧地低着头，慢慢地走着，淡淡的晚霞映着她秀美的脸庞。那瞬间的情景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两年后，她成了我的妻子。而欧·亨利的那本短篇小说被我冷落到手柜的一角，似乎很长时间再没读过。

以后的日子，每天早晨我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与妻共同哺育女儿成长，生活很平淡，一晃20年过去了。后来，我遇到了一次变故：调动一回工作，一时难以适应。那时我心中十分苦闷，一方面想着：走向社会后，你就该承担起重责任。当时女儿正在上中学，我得养家糊口；一方面感到工作中的各种压力。那段时间，我无所事事什么也不想干，看什么都烦。有一天，要悄声地问我：“什么是你的乐趣？”我仔细地想了一阵后说：“读书。”要说：“继续做你喜欢的事。”

又一次看到《欧·亨利短篇小说》。那天晚上，我在灯下重读《麦琪的礼物》。同一篇小说，同一个人读，年龄不同感觉竟大相径庭。年少时读它，那字里行间充满了浪漫的气息。而人到中年时再读它，觉得那中间弥漫着爱的真情，她能化解人心中的郁闷，能让我从精神上获得一种重生的力量。

那以后我一直觉得：一本好书总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启迪人生的智慧。

北京市朝阳区 纪建国

引入入境的美文

朱鑫文

人过四十，很少会因为书中的情节而感动。可最近读贾平凹的新作——长篇散文《静水深流》，却为作家的真诚细腻和引入入境所心动。

《静水深流》(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的是三篇长篇散文：《我是农民》、《西路上》和《老西安》，文章都以“我”的生活、游历为细节。《我是农民》是平凹青少年时期的生活自传。读后，总有一个瘦弱的身影晃荡眼前，总有一种面糊的淡香缭绕鼻端，感受到的是与“我”一起与那个时代在历练中成长；《老西安》是作家在西安城里生活20多年对古城古文化的拷问。我感受到的，是与作者一起在这座老城逛荡、漫游和在西安的角角落落中翻故寻旧、访今追昔；《西路上》是作者历经丝绸之路的艺术与自然感悟，时常使你进入幻境，仿佛自己也正行走于西路之上，赏汉风、观唐月、沐春雨而于途程中，漫漫戈壁，茫茫荒野，吮乾冰原，一条丝路蜿蜒于西行的戈壁，埋藏着无底的艰难与困境，也承载着西路久远的文明与厚实的历史，无尽收获在苦旅。

贾平凹曾经对散文作过很精到的论述：“散文更重要的还是细节，甚至比小说来得更精，来得更纯。在才、识、学比任何艺术门类都检验得严格”。因此，散文是靠真实的感受、独特的吟咏、幽深的寓意，不是靠编造故事和红红绿绿词汇的游戏。在《静水深流》中，感受和吟味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静水细流，微风荡漾，是我读《静水深流》的真实感受。而作家将书名起为“静水深流”，一个“深”字，体现了一种更高的境界。读后我才明白，平凹的这部散文不同以往的“小散文”。他在主编《美文》中倡导“大散文”不是靠文长，而是要有“幽深的寓意”，不是“引入入胜”，而是“引入入境”，只不过此境非彼境，是情境，非心境。把卷展读，不经意间便入迷境，也许就是由于平凹散文的那“细”、“真”所致。“细”以成其独特，“真”以感人至深。

注：本文作者曾出版《收藏贾平凹》、《解读贾平凹》两部书，目前已完成《贾平凹年谱上部》，列入明年出版计划。

女作家迟子建以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捧得第7届茅盾文学大奖。作为“60后”作家中独树一帜的一位，迟子建以她纯净优美的笔致和浓郁地方风情的文本赢得了很多读者。近日，刚刚从大兴安岭出来的迟子建，安然地坐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散文讲堂的访问席上，与文学青年们共同探讨文学和时代等诸多问题。从下面精彩的问答中，我们似乎可以描画出一个真实的迟子建的侧影。

怎样看待作家对时代的精神关怀？

迟子建：时代的含义是含糊而多面的。我认为只要一个作家心灵是自由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束缚他。我认为只要有一支笔，你心灵是自由的，写作就会是自由的。什么会限制写作的发展，那只有你的心灵不自由了，只有我自己会限制我自己。我们可以看看一些老作家写的回忆录，我们可以找到一种结论，就是苦难在



20多年前我第一次读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集，总觉得他的很多作品都带着浓郁的商业色彩。大都市的灯红酒绿、光怪陆离，让人目不暇接。但这篇小说却给读者描述了一个丰富的情感世界，作者的语言像携着一股淡淡的清风，让人读后有一种很温馨的感觉。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已于11月2日在茅盾的故乡乌镇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贾平凹的《秦腔》、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和麦家的《暗算》这四部长篇小说获此殊荣。笔者不无欣喜地注意到，社会和媒体对这一届茅盾文学奖的关注程度显然是超过了以往的六届。然而，近日读到一则博客，又不能不悚然心惊，其中一段云：“我看了一下茅盾文学奖本届入围的24部作品，可以保守地说一个数据：80%的文学界人士没读过其中3部以上的作品，99.9%的中国人没读过其中的任何一部作品，即使在评委中，也绝对没有一个人读过所有的24部作品。对于这样一种阅读现状的文学奖来说，无论它怎么折腾，在公众中换来的只有不屑的目光，一条陈年的社会新闻或许比它都要多一点回头

率。”话说得太绝对，却道出了确凿的事实：在读小说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正如眼下这秋

10月3日，一家知名的读书周报以《方东美：在“党”外的“书呆子”》为题，转载了《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金城出版社出版，周为筠著)一书的节选。文中写道：1918年，毛泽东一人孤身行至金陵古都南京访古览胜，并结识了“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的一批青年学生，并在他们的鼓励和资助下，才由津浦线北上，来到北京求学。文中的细节，活龙活现，犹如亲历，仿佛毛泽东是在这帮子青年志士的说服感愿下，才动了后来北京大学求学深造的念头，这才有了后来北大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的这段经历。

然而，1918年的青年毛泽东，有过书中所描述的这段栩栩如生的经历吗？经查《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传》，答案是否，根本没有。《毛泽东传》记述：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与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乘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湖南。记住，对25岁的毛泽东来说，也是第一次。而且，毛泽东立志到北大求学，也

不是书中所说的南京“少年中国”分会那批青年动员和感愿的，而是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的结果。当时，蔡和森先期到北京打前站，在与杨昌济、蔡元培接洽商议后，曾两次写信敦促毛泽东等迅速北上。

那么，在这一年里，毛泽东到了北京以后，有没有去过南京呢？据查《毛泽东年谱》，答案还是没有。年谱记载，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赴京，途中国铁路被洪水冲毁，曾在河南郾城停留一天，18日到达北京后，就与蔡和森等八人居住在景山附近的眼前三吉

2007年以来，浙江省嘉兴市着力构建以“政府主导、多级投入、集中管理、资源共享”为主要特点的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模式。这种以市县级图书馆为中心，乡镇分馆为纽带，以村(社区)图书流动站和图书流动车为基础的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被业界誉为“嘉兴模式”。

所谓“嘉兴模式”的最大特色和亮点，是在实现乡镇、村(社区)图书馆(室)全覆盖的同时，实现文献资源的一统采购、统一编目、统一配送，

书情报

《教授》 作者：郑华栋 版本：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8年11月第一版

教授这个职位早就存在，但郑华栋笔下的教授却有另一番面孔——“叫兽”。小说通过一个文学教授的眼睛来打量一个经济学教授声色犬马的生活，又通过一个经济学教授的婚姻变化折射出当代社会观念的激烈变化在知识分子生活中产生的影响。书中不但写了玫瑰露、师生恋、代人受孕等五光十色的新时尚、新事物，更写出了这个时代平静外表下所独有的混乱气息。

这些人身上留下了什么样的财富，留下了什么样的回忆。也许，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难为他留下了伟大的作品，而在中国我们只是些牢骚。精神关怀这个词有点大，有点居高临下，作家有时候容易把自己变成一种标签，如果说得重一点，是以一种文学救世主的面貌对待芸芸众生。现在我们提倡底层写作，其实我觉得没什么，我觉得我就是个生活中很卑微的分子，可能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普通大众的关怀。如果问我作为一个作家最大的动力是什么？那我觉得这种真正的精神关怀是在民间，是他们(大众)给予我精神关怀，而不是我给予他们。我们老觉得这些人过得非常悲惨、贫穷，可是他们有的时候在生活的捉襟见肘打出来的最朴素最直观最有效的生死观和生命观，活得极其从容，极其绚丽。在大大非面前，其实往往节俭的可能会是我们寄予很高厚望的以道德关怀着出现的人，而不是他们。所以，我不敢去谈精神关怀。我只能说我周围生活的普通的人，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在关怀着我温暖着我，使我的写作还可以有点信念，有所希望。

怎样看待作家对时代的责任？

迟子建：我觉得我们不期待过高，让一个作家承担这样的(拯救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作家本身也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庄严，认为你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像针对《红楼梦》搞得那些红学研究，我认为被他们一解剖，就变成一本非常糟糕的书。实际上我每隔几年都会看一遍《红楼梦》，原汁原味的小说，写得非常精彩。我们非要从中看出多么深刻的社会意义等等，这无形中会给人一种错觉——文学有这么大的功用。我觉得我们以平常心，以一颗圣贤的心来对待文学就足够了，你的善良，你的责任，你的承担感就都有了，不要想得太多。

怎样用纯美的语言表达生活琐事？

迟子建：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文学的锻炼。大学有文学院、中文系，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经过系统的锻炼使你的文字变得美好。还有一个可能是人天性上面的东西。我也写不了鸿篇巨制，但是，我觉得好的小说应该还是让

浓地弥漫起来。言说没有对象，终究是一件很悲哀的事，而长久地沉溺于与世隔绝的独白，那便是一种病理学意义上的“痴”。出版即死亡，目前的很多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往往就是这样的境遇。自然有人会问：“作家对读者承担义务吗？”作家们代表性的回答据说有两种：一是“作家表达，他不传递，诅咒普通读者”；二是“必须常常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你的读者身上，这就构成了技巧”。在如今泛娱乐化的情势下，还有哪些作家的小说被人偶尔地捧在手上，估计是不难想见。获得本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的责任编辑张亚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既深有感触又满怀期望地说：“优秀的作品需要寻找的是相应的心情和灵性、同等的思考和追寻。”作家与读者，现在最缺少的也正是这种“面面相觑”。

立传当以诚 管成子

安东夹道的狭小房子里，“陡然高炕，大被同眠”，生活相当清苦。10月，曾同蔡和森、萧子升到过保定，接送30多位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同月，认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被安排到图书馆助理员，负责新到报刊和阅览人姓名的登记工作。此年冬季，曾与萧三、罗章龙到过天津大沽口观看要窑炮台，并在北京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厂做社会调查。

也就是说，在1918年的一年中，毛泽东根本就没有到过南京去的机会，又何来的与左舜生、方东美这些人物的密切往来呢？由此

不妨学学“嘉兴模式”

钱凤伟

实行书刊借阅全市“一卡通”，也就是所有的公共图书馆之间的“篱笆墙”通通打破，在总分馆体系内，文献资源统一流通、统一检索、通借归还。

这无疑让文献图书资源的价值得到了最大化的发挥，乡镇、村(社区)图书馆(室)与市图书馆，因为“篱笆墙”的拆除，实现资源共享，在馆藏量上，几乎没有区别。而于读者，一张卡可以“坐拥”全市所有馆藏图书，通借归还，更让读者有了最大的方便。

当然，要让打破“篱笆墙”效应得以充分

的作用，明确家长的职责，寻找教育的出路……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六位教育家》 作者：智效民 版本：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8年8月第一版

书中介绍的六位教育家是：傅斯年、潘光旦、陶行知、叶圣陶、陈鹤琴和舒新城。他们都是有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教育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本书作者在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以通俗易懂、明白流畅的笔触，详细介绍了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这对于我们反思教育的功能，探讨教师的作用，明确家长的职责，寻找教育的出路……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怎样看待作家对时代的责任？

迟子建：我觉得我们不期待过高，让一个作家承担这样的(拯救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作家本身也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庄严，认为你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像针对《红楼梦》搞得那些红学研究，我认为被他们一解剖，就变成一本非常糟糕的书。实际上我每隔几年都会看一遍《红楼梦》，原汁原味的小说，写得非常精彩。我们非要从中看出多么深刻的社会意义等等，这无形中会给人一种错觉——文学有这么大的功用。我觉得我们以平常心，以一颗圣贤的心来对待文学就足够了，你的善良，你的责任，你的承担感就都有了，不要想得太多。

怎样用纯美的语言表达生活琐事？

迟子建：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文学的锻炼。大学有文学院、中文系，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经过系统的锻炼使你的文字变得美好。还有一个可能是人天性上面的东西。我也写不了鸿篇巨制，但是，我觉得好的小说应该还是让

浓地弥漫起来。言说没有对象，终究是一件很悲哀的事，而长久地沉溺于与世隔绝的独白，那便是一种病理学意义上的“痴”。出版即死亡，目前的很多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往往就是这样的境遇。自然有人会问：“作家对读者承担义务吗？”作家们代表性的回答据说有两种：一是“作家表达，他不传递，诅咒普通读者”；二是“必须常常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你的读者身上，这就构成了技巧”。在如今泛娱乐化的情势下，还有哪些作家的小说被人偶尔地捧在手上，估计是不难想见。获得本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的责任编辑张亚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既深有感触又满怀期望地说：“优秀的作品需要寻找的是相应的心情和灵性、同等的思考和追寻。”作家与读者，现在最缺少的也正是这种“面面相觑”。

怎样看待作家对时代的责任？

迟子建：我觉得我们不期待过高，让一个作家承担这样的(拯救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作家本身也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庄严，认为你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像针对《红楼梦》搞得那些红学研究，我认为被他们一解剖，就变成一本非常糟糕的书。实际上我每隔几年都会看一遍《红楼梦》，原汁原味的小说，写得非常精彩。我们非要从中看出多么深刻的社会意义等等，这无形中会给人一种错觉——文学有这么大的功用。我觉得我们以平常心，以一颗圣贤的心来对待文学就足够了，你的善良，你的责任，你的承担感就都有了，不要想得太多。

怎样用纯美的语言表达生活琐事？

迟子建：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文学的锻炼。大学有文学院、中文系，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经过系统的锻炼使你的文字变得美好。还有一个可能是人天性上面的东西。我也写不了鸿篇巨制，但是，我觉得好的小说应该还是让

浓地弥漫起来。言说没有对象，终究是一件很悲哀的事，而长久地沉溺于与世隔绝的独白，那便是一种病理学意义上的“痴”。出版即死亡，目前的很多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往往就是这样的境遇。自然有人会问：“作家对读者承担义务吗？”作家们代表性的回答据说有两种：一是“作家表达，他不传递，诅咒普通读者”；二是“必须常常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你的读者身上，这就构成了技巧”。在如今泛娱乐化的情势下，还有哪些作家的小说被人偶尔地捧在手上，估计是不难想见。获得本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的责任编辑张亚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既深有感触又满怀期望地说：“优秀的作品需要寻找的是相应的心情和灵性、同等的思考和追寻。”作家与读者，现在最缺少的也正是这种“面面相觑”。

怎样看待作家对时代的责任？

迟子建：我觉得我们不期待过高，让一个作家承担这样的(拯救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作家本身也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庄严，认为你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像针对《红楼梦》搞得那些红学研究，我认为被他们一解剖，就变成一本非常糟糕的书。实际上我每隔几年都会看一遍《红楼梦》，原汁原味的小说，写得非常精彩。我们非要从中看出多么深刻的社会意义等等，这无形中会给人一种错觉——文学有这么大的功用。我觉得我们以平常心，以一颗圣贤的心来对待文学就足够了，你的善良，你的责任，你的承担感就都有了，不要想得太多。

怎样用纯美的语言表达生活琐事？

迟子建：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文学的锻炼。大学有文学院、中文系，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经过系统的锻炼使你的文字变得美好。还有一个可能是人天性上面的东西。我也写不了鸿篇巨制，但是，我觉得好的小说应该还是让

浓地弥漫起来。言说没有对象，终究是一件很悲哀的事，而长久地沉溺于与世隔绝的独白，那便是一种病理学意义上的“痴”。出版即死亡，目前的很多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往往就是这样的境遇。自然有人会问：“作家对读者承担义务吗？”作家们代表性的回答据说有两种：一是“作家表达，他不传递，诅咒普通读者”；二是“必须常常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你的读者身上，这就构成了技巧”。在如今泛娱乐化的情势下，还有哪些作家的小说被人偶尔地捧在手上，估计是不难想见。获得本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的责任编辑张亚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既深有感触又满怀期望地说：“优秀的作品需要寻找的是相应的心情和灵性、同等的思考和追寻。”作家与读者，现在最缺少的也正是这种“面面相觑”。

怎样看待作家对时代的责任？

迟子建：我觉得我们不期待过高，让一个作家承担这样的(拯救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作家本身也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庄严，认为你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像针对《红楼梦》搞得那些红学研究，我认为被他们一解剖，就变成一本非常糟糕的书。实际上我每隔几年都会看一遍《红楼梦》，原汁原味的小说，写得非常精彩。我们非要从中看出多么深刻的社会意义等等，这无形中会给人一种错觉——文学有这么大的功用。我觉得我们以平常心，以一颗圣贤的心来对待文学就足够了，你的善良，你的责任，你的承担感就都有了，不要想得太多。

怎样用纯美的语言表达生活琐事？

迟子建：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文学的锻炼。大学有文学院、中文系，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经过系统的锻炼使你的文字变得美好。还有一个可能是人天性上面的东西。我也写不了鸿篇巨制，但是，我觉得好的小说应该还是让

浓地弥漫起来。言说没有对象，终究是一件很悲哀的事，而长久地沉溺于与世隔绝的独白，那便是一种病理学意义上的“痴”。出版即死亡，目前的很多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往往就是这样的境遇。自然有人会问：“作家对读者承担义务吗？”作家们代表性的回答据说有两种：一是“作家表达，他不传递，诅咒普通读者”；二是“必须常常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你的读者身上，这就构成了技巧”。在如今泛娱乐化的情势下，还有哪些作家的小说被人偶尔地捧在手上，估计是不难想见。获得本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的责任编辑张亚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既深有感触又满怀期望地说：“优秀的作品需要寻找的是相应的心情和灵性、同等的思考和追寻。”作家与读者，现在最缺少的也正是这种“面面相觑”。

怎样看待作家对时代的责任？

迟子建：我觉得我们不期待过高，让一个作家承担这样的(拯救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作家本身也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庄严，认为你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像针对《红楼梦》搞得那些红学研究，我认为被他们一解剖，就变成一本非常糟糕的书。实际上我每隔几年都会看一遍《红楼梦》，原汁原味的小说，写得非常精彩。我们非要从中看出多么深刻的社会意义等等，这无形中会给人一种错觉——文学有这么大的功用。我觉得我们以平常心，以一颗圣贤的心来对待文学就足够了，你的善良，你的责任，你的承担感就都有了，不要想得太多。

怎样用纯美的语言表达生活琐事？

迟子建：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文学的锻炼。大学有文学院、中文系，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经过系统的锻炼使你的文字变得美好。还有一个可能是人天性上面的东西。我也写不了鸿篇巨制，但是，我觉得好的小说应该还是让

人看得懂，倒未必完全是家长里短、日常化的状态出现的小说，我觉得那里蕴含的道理也许会比较深。所以，鲁迅写《狂人日记》、《孔乙己》这样的作品，你也能看到生活的日常性。他的《铸剑》写三颗人头在滚沸的水里报仇的细节，我觉得真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达不到的，既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又是伟大的浪漫主义。可他用的还是家长里短的办法。

怎样看待后辈作家的写作现状？

迟子建：我和格非聊天的时候谈过，其实我们这一批60年代的作家，对于比我们年轻的70年代、80年代的作家寄予很高的期望，当然这种期望并非居高临下或者倚老卖老，因为我觉得他们身上的锐气或是勇气可能更强。但是，就我看到的一些作品，可能因为是流行性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在感观上的东西多于灵魂上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形式和语言充其量只是一个人的穿着，我期望“80后”、“90后”哪怕“70后”，有一种灵魂上的、骨子里的叛逆，而不是感官上的。如此，真正的文学革命才会来。

怎样看待后辈作家的写作现状？

迟子建：我和格非聊天的时候谈过，其实我们这一批60年代的作家，对于比我们年轻的70年代、80年代的作家寄予很高的期望，当然这种期望并非居高临下或者倚老卖老，因为我觉得他们身上的锐气或是勇气可能更强。但是，就我看到的一些作品，可能因为是流行性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在感观上的东西多于灵魂上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形式和语言充其量只是一个人的穿着，我期望“80后”、“90后”哪怕“70后”，有一种灵魂上的、骨子里的叛逆，而不是感官上的。如此，真正的文学革命才会来。

怎样看待后辈作家的写作现状？

迟子建：我和格非聊天的时候谈过，其实我们这一批60年代的作家，对于比我们年轻的70年代、80年代的作家寄予很高的期望，当然这种期望并非居高临下或者倚老卖老，因为我觉得他们身上的锐气或是勇气可能更强。但是，就我看到的一些作品，可能因为是流行性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在感观上的东西多于灵魂上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形式和语言充其量只是一个人的穿着，我期望“80后”、“90后”哪怕“70后”，有一种灵魂上的、骨子里的叛逆，而不是感官上的。如此，真正的文学革命才会来。

怎样看待后辈作家的写作现状？

迟子建：我和格非聊天的时候谈过，其实我们这一批60年代的作家，对于比我们年轻的70年代、80年代的作家寄予很高的期望，当然这种期望并非居高临下或者倚老卖老，因为我觉得他们身上的锐气或是勇气可能更强。但是，就我看到的一些作品，可能因为是流行性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在感观上的东西多于灵魂上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形式和语言充其量只是一个人的穿着，我期望“80后”、“90后”哪怕“70后”，有一种灵魂上的、骨子里的叛逆，而不是感官上的。如此，真正的文学革命才会来。

怎样看待后辈作家的写作现状？

迟子建：我和格非聊天的时候谈过，其实我们这一批60年代的作家，对于比我们年轻的70年代、80年代的作家寄予很高的期望，当然这种期望并非居高临下或者倚老卖老，因为我觉得他们身上的锐气或是勇气可能更强。但是，就我看到的一些作品，可能因为是流行性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在感观上的东西多于灵魂上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形式和语言充其量只是一个人的穿着，我期望“80后”、“90后”哪怕“70后”，有一种灵魂上的、骨子里的叛逆，而不是感官上的。如此，真正的文学革命才会来。

怎样看待后辈作家的写作现状？

迟子建：我和格非聊天的时候谈过，其实我们这一批60年代的作家，对于比我们年轻的70年代、80年代的作家寄予很高的期望，当然这种期望并非居高临下或者倚老卖老，因为我觉得他们身上的锐气或是勇气可能更强。但是，就我看到的一些作品，可能因为是流行性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在感观上的东西多于灵魂上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形式和语言充其量只是一个人的穿着，我期望“80后”、“90后”哪怕“70后”，有一种灵魂上的、骨子里的叛逆，而不是感官上的。如此，真正的文学革命才会来。

怎样看待后辈作家的写作现状？

迟子建：我和格非聊天的时候谈过，其实我们这一批60年代的作家，对于比我们年轻的70年代、80年代的作家寄予很高的期望，当然这种期望并非居高临下或者倚老卖老，因为我觉得他们身上的锐气或是勇气可能更强。但是，就我看到的一些作品，可能因为是流行性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在感观上的东西多于灵魂上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形式和语言充其量只是一个人的穿着，我期望“80后”、“90后”哪怕“70后”，有一种灵魂上的、骨子里的叛逆，而不是感官上的。如此，真正的文学革命才会来。

怎样看待后辈作家的写作现状？

迟子建：我和格非聊天的时候谈过，其实我们这一批60年代的作家，对于比我们年轻的70年代、80年代的作家寄予很高的期望，当然这种期望并非居高临下或者倚老卖老，因为我觉得他们身上的锐气或是勇气可能更强。但是，就我看到的一些作品，可能因为是流行性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在感观上的东西多于灵魂上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形式和语言充其量只是一个人的穿着，我期望“80后”、“90后”哪怕“70后”，有一种灵魂上的、骨子里的叛逆，而不是感官上的。如此，真正的文学革命才会来。

怎样看待后辈作家的写作现状？

迟子建：我和格非聊天的时候谈过，其实我们这一批60年代的作家，对于比我们年轻的70年代、80年代的作家寄予很高的期望，当然这种期望并非居高临下或者倚老卖老，因为我觉得他们身上的锐气或是勇气可能更强。但是，就我看到的一些作品，可能因为是流行性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在感观上的东西多于灵魂上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形式和语言充其量只是一个人的穿着，我期望“80后”、“90后”哪怕“70后”，有一种灵魂上的、骨子里的叛逆，而不是感官上的。如此，真正的文学革命才会来。

迟子建：我和格非聊天的时候谈过，其实我们这一批60年代的作家，对于比我们年轻的70年代、80年代的作家寄予很高的期望，当然这种期望并非居高临下或者倚老卖老，因为我觉得他们身上的锐气或是勇气可能更强。但是，就我看到的一些作品，可能因为是流行性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在感观上的东西多于灵魂上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形式和语言充其量只是一个人的穿着，我期望“80后”、“90后”哪怕“70后”，有一种灵魂上的、骨子里的叛逆，而不是感官上的。如此，真正的文学革命才会来。

怎样看待后辈作家的写作现状？

迟子建：我和格非聊天的时候谈过，其实我们这一批60年代的作家，对于比我们年轻的70年代、80年代的作家寄予很高的期望，当然这种期望并非居高临下或者倚老卖老，因为我觉得他们身上的锐气或是勇气可能更强。但是，就我看到的一些作品，可能因为是流行性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在感观上的东西多于灵魂上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形式和语言充其量只是一个人的穿着，我期望“80后”、“90后”哪怕“70后”，有一种灵魂上的、骨子里的叛逆，而不是感官上的。如此，真正的文学革命才会来。

一周书情

2008年全国出版业网站年会近日在京召开。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宋晓红代表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聂震宁致辞，他说：当前出版业大力应用数字化新技术，推进传统出版向数字化出版转型取得了显著成绩，数字化、网络化是出版业发展的大趋势。作为数字化出版桥头堡的出版行业网站建设，将成为未来出版社发展的重点之一，换句话说，出版业网站建设是我国整个出版业信息化、数字化程度的缩影。现在，我国出版业正站在一个值得期盼的历史转折点上，数字化时代对传统出版产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机遇，传统出版业可以充分利用新技术去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飞跃与转变，数字出版将成为中国出版业转型的必由之路。

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有关他的书籍在中国销量猛增，提高约80%。据了解，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奥巴马自传《无畏的希望》卖得最好，已经加印了3次，累计印量达4.5万册。社科文献出版社的《奥巴马：他将改变美国》需求也明显增加，库中原有的3000多本被打订购一空。译林出版社已经拿到奥巴马另一本自传《父辈的梦想》的版权，目前也正在加紧翻译中。除了奥巴马系列图书，一些关于美国大选的图书如《美国政治风向标》等也开始热销。

近来，健康类图书持续热销，占据了排行榜的首位。《从头到脚说健康》、《细节决定健康》、《黄帝内经》等颇受市民欢迎，有的还多次断货。但业界人士对此类图书的跟风出版颇为担心。据媒体公布的统计数字：2004年共有290家出版社参与健康类图书的竞争，2007年则升至362家，进入2008年，这个数据继续增长，不断有新出版社涌进竞争激烈的健康类图书的市场。2007年上半年大众健康类图书的同比增长率超过32%，远远超过整体图书零售市场水平(14.23%)。综观这些图书，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有的甚至不具有科学性，专家提醒消费者慎选，以免给身体造成伤害。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系列随笔集《康复的家庭》、《宽松的纽带》和《在自己的树下》已由漓江出版社引进出版。三部书囊括了作者的创作、性情、家庭等多方面情况。其中，《在自己的树下》最值得关注，它是大江健三郎的自传性随笔集，收录文章16篇，介绍了自己的学习和成长经历。书中，作者还讲述了年幼时的奇特经历以及他对战争创伤的亲身体验与深刻反省。三本书中的插图均由大江健三郎的夫人由佳里手绘而成。

香港华人梁羽生近日在悉尼荣获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颁发的“澳华文化界终生成就奖”。现年84岁的梁羽生是新式武侠小说开山鼻祖，1954年至1984年间，共撰写和发表了35部武侠小说，共计1000万字。由于金庸的名气太大，盖过了梁羽生，但他在许多读者心中还是很有地位的。此次他获得这个终生成就奖，也是众望所归。据说，退休后的梁大侠于1987年定居悉尼，相继撰写了《古今漫话》和《笔花六照》等散文和随笔集。(肖一)



日本“心灵鸡汤”东渡中国

《向着光明》中文版面世

本报讯 有着日本“心灵鸡汤”之称的《向着光明——100朵鲜花》一书，近日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引进中国。这本温暖了日本千万民众的“德育教科书”，自问世以来已印制97版、发行65万册，并被翻译成韩文、英文等多个版本。现在，它开始了在中国的“温暖”旅程。

《向着光明》的作者高森显彻著述甚丰，他的书大多倡导人们要从善、要平和、要有同情心。此书秉承了他的一贯风格。在书中，高森显彻选取了100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内中人物囊括了古今今来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和艺术家，如日本的德川家康、英国的丘吉尔、德国的俾斯麦、古希腊的苏格拉底、美国的富兰克林、法国的拿破仑及中国的军事奇才韩信等等，通过他们生活中极其平凡的故事，作者挖掘出了人生中的一个个小哲理。

书中既有律已待人之道，“人之所以生气痛苦，原因都在于认为自己是对的”；又有明心见性之谈，“轻视现有工作的人，无论处于什么地位都会心怀不满，牢骚满腹的人是不会成功的”；更有为人处世之论，“忍不能忍之才为忍，重要的是心，是心态”。对于压力重重、心浮气躁的现代人来说，这些发人深省、寓意深长的小哲理无疑是获得幸福和快乐的法则。

有读者读完此书后感叹：“对于人情淡漠、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来说，这本书实在是一本不可或缺的书。”

更有书评家给予这本书很高评价：“我特别希望青少年们阅读。我相信读了这本书，肯定会有很多不良少年回到正道，也肯定会使很多孩子找到希望之光，茁壮成长。”